

乡村振兴进程中居民参与的类型细分与激励对策

周炎炎,张一凡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基于“意愿—能力”二维分析框架,研究构建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四象限模型,包括有心有力的“领导者”、有心无力的“参加者”、有力无心的“潜能者”以及无心无力的“观望者”。实证分析发现制约居民参与的核心矛盾为:社区认同弱化、活动供需错位及制度激励失衡。对此,研究提出分类激励对策:面向“领导者”,构建资源分配、荣誉激励、决策赋权与容错保障相结合的多维赋能体系;阶梯式能力建设,推动“参加者”由“劳力参与”向“智力参与”转型;数字平台联结、创新分配机制、重塑文化认同、创设弹性岗位,技术“资本化”激发“潜能者”优势;针对“观望者”,推行“低门槛—快反馈—深参与”的转化机制。同时,通过“动态监测—制度衔接—文化认同”三维保障机制,培育居民参与惯习,促进四类主体的动态转化与协同治理。

关键词: 乡村振兴;居民参与;激励对策;城乡融合;“三农”问题;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94(2025)04-0087-12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农村居民作为乡村振兴的直接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其参与意愿、参与程度及行为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成效与可持续性^[1]。传统政策导向中,农民的角色定位主要服务于国家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而乡村振兴战略更加注重农民的权益保护、社区参与及全面发展,强调以人的振兴带动物的振兴^[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农村地区仍面临最为艰巨和繁重的任务。新形势下,传统的居民参与动员机制已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及农村居民的现代性转型需求,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当前,我国农村建设更加注重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居民自发参与,致力于构建符合农村居民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居民参与新体系。因此,科学分析农村居民参与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在丰富制度供给和加大资源投入的同时,更加侧重激发广大农村居民的广泛参与,成为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核心议题。

国内外对居民参与的研究已形成多重视角。国外研究早期侧重公民参与的政治意涵,近年来逐渐转向社区发展与民生领域。理性选择理论^[3]强调个体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参与决策逻辑,认为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时,会系统评估潜在收益与成本,仅当预期收益超过成本时选择参与。社会资本理论^[4]则从信任、规范与社会网络关系阐释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指出居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居民参与的激励机制研究”(19YJJCZH274)。

作者简介: 周炎炎,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发展、西部乡村治理。

引文格式: 周炎炎,张一凡. 乡村振兴进程中居民参与的类型细分与激励对策[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04): 87-98.

民间的信任关系、共享规范及社会网络为集体行动提供了结构性支持与协调机制。二者共同揭示了居民参与的复杂性:理性选择关注个体效用最大化,社会资本则为个体决策提供结构性约束与支持。例如,农村居民可能因利益驱动选择参与,如政策补贴^[5],而社会网络中的互惠规范也可能促使其履行社区义务^[6]。国内研究聚焦社区治理情境下的居民参与,形成以下理论路径:治理理论强调“善治”,需依赖居民自愿参与^[7],只有居民自觉认同并自愿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社会资本与理性选择的融合视角认为,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任降低参与成本,理性选择则解释个体如何通过参与获取资源,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影响居民的参与决策;社会行动理论关注微观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如政策认同与活动设计^[8],探讨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居民的参与行为。

既有研究虽揭示了居民参与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但仍存在局限:其一,过度依赖政府动员模式,忽视内生激励机制,相对缺乏居民参与主动性与持续性的保障机制分析;其二,理论移植后缺乏对农村居民细化的针对性分析^[9],未能充分考量其在个体特征与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基于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复杂性与利益导向特征,研究聚焦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强调个体决策的效用最大化逻辑,以解释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动机。研究旨在回答: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参与行为存在哪些类型差异?如何针对不同参与类型设计差异化的激励策略以激活其内生动力?期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乡村振兴进程中居民参与行为及其类型学分析

本文首先聚焦分析乡村振兴中居民参与行为的实际状况及其内在差异,尝试构建以“意愿”(心)和“能力”(力)为核心的二维分类框架,并基于调查研究区分出“领导者”(强心强力)、“参加者”(强心弱力)、“潜能者”(弱心强力)和“观望者”(弱心弱力)四类典型群体,深度刻画不同居民群体的参与特质,为后续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一) 调查设计与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四川省9县51村抽取700名居民开展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97份。样本覆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行政村,受访者性别、年龄、职业分布与四川省农村常住人口普查数据相近(误差率 $<5\%$),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经分析,农村居民总体参与意识与意愿较好,但存在参与意识、意愿向参与行为转化不足的现象。参与内容方面,平均每人参与过1.97类社区活动,参与“村委会选举”“社区公益活动”等社区活动的比例较高。在参与能力的自我评估方面,51.0%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具备参与能力,34.9%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参与能力一般,13.5%的受访者对自身能力评价较低。

居民的实际参与状况因个体自然特征与社会特征的差异而呈现显著分化。研究通过考察居民参与的个体差异后发现:不同职业、不同乡村振兴了解度及关注度的群体,其参与意识与意愿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乡村振兴了解度和乡村振兴关注度不同者,参与内容存在显著差异($p<0.05$);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

①研究采用 $\alpha=0.05$ 作为统计显著性阈值, p 值(probability value)反映观测结果与原假设(各组无差异)相符的概率。 $p<0.05$ 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乡村振兴了解度和乡村振兴关注度不同者,其对参与能力符合度的自评存在显著差异($p < 0.05$)。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参与主体覆盖面有限且分化特征显著,居民对乡村振兴的认知深度与关注强度正向预测其参与意识,并显著提升其参与意愿及自我效能感。

(二) 参与行为的类型学构建:意愿与能力的二维向度

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面临意愿与能力不匹配的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认同感薄弱与参与行动力不足。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转换分析,研究将参与意识与意愿定义为“心”,参与内容与能力定义为“力”。根据农村居民在两者上的强弱差异,归纳四类参与行为类型:强意愿—强能力的“领导者”、强意愿—弱能力的“参加者”、弱意愿—强能力的“潜能者”,以及弱意愿—弱能力的“观望者”(见图 1),探讨其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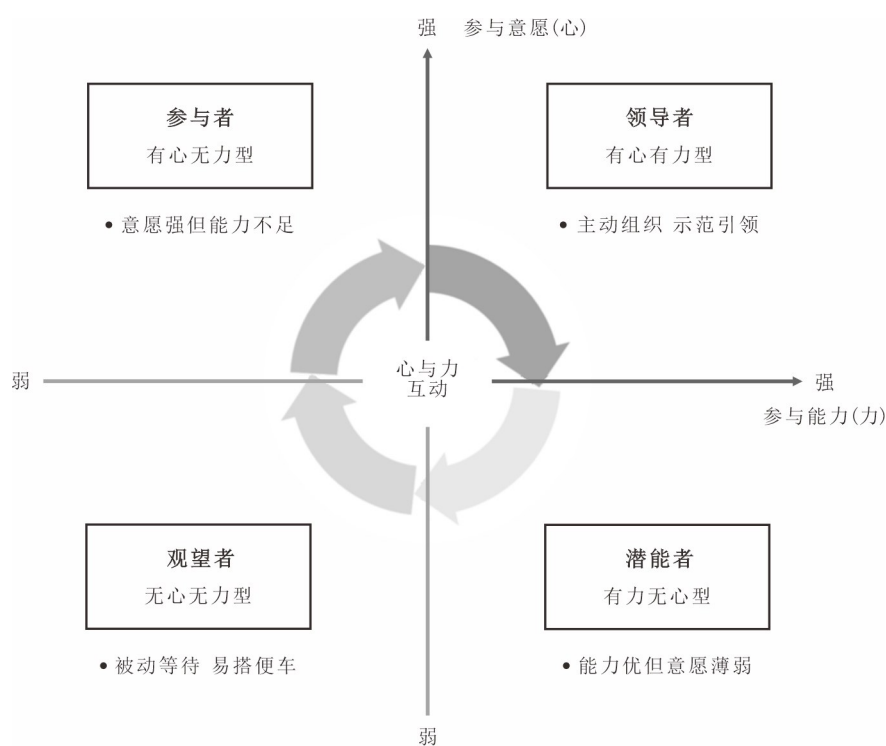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居民参与类型四象限模型

1. 有心有力的“领导者”:强意识、强能力

“领导者”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力量和乡村治理秩序的关键维护者,其通过组织协调可有效提升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与稳定性。研究发现,“其他职业”“务农并打工”“离、退休”者参与意识与意愿均较强;与政治身份为干部的农民参与意愿更强^[10]这一普遍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调查样本中职业为“公务员”者参与意识较强、参与意愿却较弱;“其他职业”“公务员”“务农并打工”者对自己参与能力符合度评价最高。此类居民属于乡村振兴中的“领导者”群体,约占总样本的 20%。其中,“务农并打工”者和“公务员”更偏向于参加“产业协会、技术咨询和服务等”活动,通过示范效应强化其他居民的参与主动性。“领导者”内部因职业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亦有分化:一部分“领导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和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较好地理解乡村振兴的目标和需求,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11];另一部分“领导者”则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市场敏感性,能够有效地连接小农户与市场,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市场化^[12]。

“领导者”往往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能够利用自身资源和影响力,推动有利于乡村治理和发展的各类项目,带动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然而,鉴于社区环境的复杂性、居民需求的多样性以及资源分配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下乡、年龄结构老化、代际分工和城

乡公共服务差异等带来的结构性挑战^[13]，“领导者”在参与乡村振兴时也面临角色价值感知趋于淡化的困境。部分受访“领导者”认为乡村振兴政策虽具积极意义，但实际推进中存在执行惰性。“公务员”更了解政策导向和公共事务，但由于事务性工作繁忙，难以投入充分时间和精力到乡村振兴中；或是缺乏成功案例示范和实际操作经验，获得的正向反馈较少，从而参与动力减弱、参与意愿降低；还可能产生挫败感和倦怠情绪，出现无序参与行为。一些制度性障碍会影响年轻“公务员”的参与效果，其主导的乡村治理容易呈现出一种“脱嵌的现代化”形态^[14]。“其他职业”“务农并打工”者更熟悉当地实际需求和问题，既能“搭把手”也能“挑大梁”^[15]，但乡村社会结构的松散性和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可能会削弱他们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一些“领导者”还表示，当前社区不能有效对接居民的参与需求，社区常设公共活动的有效参与比例较低，尤其表现在居民对社区建设及公益项目的信息获取不足、交流渠道匮乏，以及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参与机制不畅，亟需建立更有效的良性循环机制。

2. 有心无力的“参加者”：强意识、弱能力

调查对象在自评参与能力时普遍较为保守，尤其是参与意识和参与意愿状况都较好的“务农”“自己做生意”“打工”者和部分“离、退休者”参与能力自评度却较低，调查对象中自评呈现为“强意识—弱能力”的居民近40%。研究将这类参与意愿和感知价值较高但参与集体行动的频率较低的居民归类为“参加者”：这类人群多忙碌于维持和改善基本生活，只在闲时随机性地进行一些社区参与；其主动参与的活动类型单一，文化娱乐类活动占比较高，对实际能反映参与能力的社区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类型的活动参与程度则较低。受限于知识、技能或资源，“参加者”往往无法深入影响社区决策。

一方面，“参加者”参与意识较强，但参与意愿存在差异性。部分“参加者”对乡村振兴表现出较高兴趣，但“愿意参加的活动较少”，多因认为自身能力有限而感到焦虑不安；部分“参加者”对居民参与具有片面理解，仅将其视为在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将自身参与乡村振兴视为一种“帮忙”，或只是被动遵循周围居民的参与行为。这类“参加者”抱有“参与与否都可以”的“凑热闹”心态，对互惠共利的集体行动存在价值认知与责任感知的双重缺失。“村里如果要有些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去，我可能会去，为什么？靠关系吧，帮帮忙”（访谈编号：R01）。部分受访“参加者”的参与行为并非基于理性考量，虽参与其中，但对实际收益缺乏了解，且在没有经济激励的情况下，仅因人情关系而被动加入。另一方面，部分受访者表示对“正式活动”参与意愿较低，但在宣传动员下可能选择性参与技能培训类活动。此外，有不少“参加者”认为活动“见不到实际的好处”“听不懂在讲什么”“感觉就是在聊天”。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或社区未能提供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参与活动过程中，一些“参加者”对活动接受能力有限，从而对社区参与持有怀疑或失去信心，对社区参与浅尝辄止，制约了其后续主动参与的意愿，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部分居民对社区建设和居民赋能类项目的参与度较低，实际参与公共事务仅停留在表层，未能深入体验社区活动，从而形成参与表象化困境，表现为实际参与不足且自我评估能力薄弱。

3. 有力无心的“潜能者”：弱意识、强能力

“潜能者”主要包括部分“企事业单位人员”“自由职业者”“打工”者，占比约30%，其往往持有“如果村里需要我帮忙，我会尽力”的态度，社区参与十分被动。由于参与社区事务较少，“潜能者”对“我有能力参与社区活动”状况符合度表示“一般”或“不确定”，在乡村振兴中存在自我

定位不明和对战略理解不到位的问题。“都是些老年人才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像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做,我可以喊我家里的婆婆爷爷去,平时多和他们说些,多积极的。我反正很少去”(访谈编号:R02)。部分农村居民向往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的期待逐渐降低,同时,由于乡村产业的盈利周期长、市场风险大,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潜能者”更多地依赖于非农就业,尤其是城镇的低技能劳动市场^[16],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地的工作机会,其经济活动和社会参与往往与农村社区脱节,这是“潜能者”参与主动性不强的关键因素。

调查发现,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划分上,主要参与者总体为常住中老年参与主体或为以公务员职业为主的常住青年参与主体,本地零工、外出务工或经商参与主体社区参与意识较为薄弱。“潜能者”通常具有一技之长或独特的社会地位,往往只在涉及自身利益或家庭利益时才会参与社区事务,如土地纠纷、环境保护等领域,没有将个人优势转化为社区发展的动力;“潜能者”通常没有意识到作为社区的主人和群体中的一员应该尽一份责任和义务,往往持有漠视态度,对社区事务表示不关心甚至不配合。在访谈中提到“参与乡村振兴”,“潜能者”多表示“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或者“与生活好像不太有关系”。“潜能者”的参与往往是短暂的、有条件的,常常陷入“既然不了解还不如不参与”的参与困境。“我的文化水平在村里算高的,参与能力?要看什么活动了,文化程度高也不敢说啥都行吧,多去几次,可能也就熟了吧,不好说,我觉得自己接受能力还行吧,这里组织的培训啊,肯定没城里的多,效果怎么样其实都不好说”(访谈编号:R03)。部分受访的“潜能者”虽面临实际参与障碍,且参与意愿存在不确定性,但其自我效能感表现良好。大量研究表明,这类群体可通过技术赋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行动者。特别是在乡村治安联防、人居环境整治和文化旅游开发等领域,“乡村工匠”等技能型人才能够发挥独特的支撑性作用。

4. 无心无力的“观望者”:弱意识、弱能力

调查对象中10%左右的居民认为“社区参与对我没好处”“我没有能力参与社区活动”,研究将这类居民归类为“观望者”,多为“失业、待业”者和“丧偶”者。受限于农村生存条件和自身经济限制,“观望者”尤其重视个人的短期收益,对社区项目的参与主要关注收入生成部分,认为参与社区活动的成本,如时间和精力投入远远大于收益。同时,“观望者”往往不愿意改变现状,在面对公共事务时表现出沉默性对抗与应付性参与,极大程度上依赖外部的引导与激励。此外,社区缺乏明确的参与渠道和激励机制,“观望者”能够有效参与的社区事务面较窄,参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其难以通过参与获得预期的利益或认可,参与意愿进一步降低。

在参与频次和参与程度极低的情况下,“观望者”的参与还存在“搭便车”现象,居民主人翁意识有待唤醒。“观望者”存在对公共事务的错误理解,或认为过于繁琐而影响自身生活便利,或存在畏难情绪,倾向于期望他人去担当起部分公共职责的角色,往往心安理得地接受社区发展的成果而不愿意承担责任。“像这种大事都自会有人负责的,哪轮得到我们这些老百姓出力。这个有什么规定我必须去吗?你喊我我还是要走的……有些人热心肠就去了,没必要要求我们这些糊口的……我们还是希望有人去做这些事情”(访谈编号:R04)。“观望者”经常将自己置身事外,让政府唱“独角戏”,但其参与不足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其“公民性缺失”^[17],“观望者”参与不足的现状具有可改善性。部分“观望者”受限于年龄、身体或心理因素,自感无力参与或难以贡献社区发展,才对社区的发展持消极、观望和搭便车态度。“好不容易技术员来做一次培训,讲的都听不懂,实际做我们可能以前都会哦,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会,也学不来,谁叫我们文

化水平低呢,这样大家下次可能都不是太想来了,知道可能有用,但学不来还来什么啊,年纪也大了,学了也没啥意义”(访谈编号:R05)。

三、乡村振兴进程中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

农村居民的深度参与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当前实践中的居民参与不足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进程的一大阻力。以下将从个体社区认同、活动供需和制度激励三个层面经验揭示乡村振兴中居民参与不足的原因,为对策研究提供分析依据。

(一) 社区认同弱化:传统纽带断裂与现代价值冲突

人口大量外流与市场经济的渗透,削弱了农村社区基于血缘、地缘等的互助传统^[18],居民对公共事务的认知逐渐从“集体责任”转向“个人得失”。同时,村庄利益密度的降低导致留守群体与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日益分化^[19],公共事务难以凝聚共识。例如,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矛盾与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等问题,可能会直接削弱居民对社区的信任。此外,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可能会使一些村庄更侧重建设任务的完成而忽视居民实际需求,村民的实际需要没有在乡村建设中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容易进一步导致他们的社区认同弱化。

(二) 活动供需错位:形式化参与与主体性流失

据调查分析,当前乡村公共事务供给存在三重脱节:一是政策信息传递单向化,农村留守老人等群体可能因不熟悉智能手机而成为“信息边缘人”,如一些重大公共事项仅通过微信群通知,部分家庭可能完全不知情;二是活动内容与居民核心关切脱节,如“文明家庭评选”仅要求卫生达标,却未与产业帮扶挂钩,农村居民参与积极性较低;三是议事渠道形式化,线上平台沦为“点赞工具”,线下会议常以“举手表决”草草收场。调研中一位农村居民坦言:“开会就是去签字,提了意见也没人管。”这种错位使居民参与异化为“应付差事”,削弱了居民的主体价值感。

(三) 制度激励失衡:短期导向与长效保障缺失

研究发现,现有参与机制存在三重矛盾:其一,动员方式重“完成任务”、轻“能力培育”,例如,强制要求每户参与环境整治打卡但缺乏技术指导,居民往往消极应付;其二,激励手段偏重“流动红旗”“模范家庭”等荣誉表彰,但缺乏技能培训、项目分红等实质性支持,一些社区实行的“积分制”因无法兑换农资而被弃用;其三,保障体系碎片化,部门各自为政,如文化部门组织文艺演出、农业部门推广技术培训,但活动时间冲突、资源重复浪费。农村居民在“高投入—低回报”的理性权衡下,逐渐形成规避参与的消极心态。

四、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分类激励对策探究

针对“领导者”(强意识、强能力)、“参加者”(强意识、弱能力)、“潜能者”(弱意识、强能力)和“观望者”(弱意识、弱能力)四类居民的差异化行为特征,研究提出“分类激励—协同保障”双轨策略:分类激励方面,通过精准匹配激励工具与群体特征,构建“能人带动—群体参与—制度维持”的传导机制,推动个体实现从被动卷入到主动引领的质性跃迁。通过“关键少数激活沉默多数”的实践逻辑,重构农村社区的参与生态。协同保障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通过制度设计的刚性约束确立权责边界,通过集体记忆再生产与道德评议机制塑造居

民可持续参与惯习。三者耦合形成的治理生态,为“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的治理转型提供可能的制度载体。

(一) 多维赋能,支持“领导者”长效参与

“领导者”作为乡村振兴实践的核心驱动力,其持续参与需依托资源、荣誉、决策等多个维度的激励,并通过制度性安排强化“领导者”的权威合法性,这与张必春提出的“脸面观”形成呼应^[21],既要满足“领导者”物质利益与职业发展的“面子”需求,又要通过公共事务赋权巩固其“里子”地位。

第一,资源赋能,强化“领导者”的发展支撑力。建立“项目资源包”精准投放机制,为产业带头人匹配专项资金与专家团队,实施“一村一策”定制化帮扶。同时,为“项目资源包”设置动态调整机制,依据项目阶段性成果,追加资金或调整支持方向,确保资源投入与绩效产出正向关联。

第二,荣誉赋能,塑造“领导者”的社会认同感。构建“乡村振兴功勋榜”分层表彰体系,如村级设立“月度之星”评选,乡镇级颁发“年度领航者”勋章,市级推荐参评“省级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同时,利用传统与新媒体融合的传播矩阵,如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微信公众号及短视频平台等,宣传“乡村振兴领路人”事迹,并纳入地方志编纂,在村史馆设立专题展区,形成“物质奖励—精神表彰—职业发展”的复合激励链,增强对“领导者”参与行为的社会认可度与合法性,提升其参与价值感和积极性。

第三,决策赋能,提升“领导者”的治理话语权。设立“乡贤议事厅”机制,赋予“领导者”制度化的政策建议权与项目监督权。具体包括:参与村级《乡村振兴五年发展规划》的咨询论证与建议提出;经邀请或按机制列席涉及本村核心议题的镇政府工作会议;对村级重大项目决策过程拥有监督质询权及程序性干预权,如依据规定提出缓议建议,但需经村民代表会议或上级部门最终裁定。为保障赋权实效,同步构建“复合型赋能机制”:定期组织“领导者”参与政策法规研修与跨区域参访学习,系统提升其参与治理所需的规则认知、实务技能与发展视野,从而持续激发其投身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目标达成效能。

第四,容错保障,激发“领导者”的创新主动性。建立“试错—反馈—优化”机制^[22],如编制《乡村振兴创新实践白名单》,对探索性项目实行“备案免责”管理。同时,设立创新风险基金,用于补偿因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增强“领导者”的创新动力。

(二) 能力建设,提升“参加者”参与效能

针对“参加者”普遍存在的技能匮乏与参与浅层化问题,研究基于郑浩生(2024)^[23]提出的“培训—实践—赋权”理论框架,设计“基础—进阶—实践—支持”四阶能力培育体系,推动“参加者”由“劳力参与”向“智力参与”转型,逐步实现从被动“参加”到主动“参与”的跃迁。

第一,基础层:聚焦“参加者”的技能筑基与认知升级。通过入户访谈、问卷调查识别“参加者”的技能短板,开设“田间课堂”标准化培训模块,聚焦农机操作、电商运营、手工艺制作等实用技能;同时邀请本土成功者现身说法,并在真实场景中检验学习成果。

第二,进阶层:开展积分激励与资源兑换。实施“参与积分银行”制度,将环境整治、文化活动等参与行为量化为积分,如按1积分=1元等价物的标准兑换发展资源,包括农资代金券、社区公共设施使用等。

第三,实践层:重视对“参加者”的决策赋权与能力升华。通过组织座谈会、工作坊等形式,围绕社区真实议题实施参与式技术^[24],让“参加者”较为组织化地参与到项目活动的制定和实施过程^[25],提升其自主决策能力;组织“乡村振兴沙盘推演”,围绕社区的土地流转、产业布局等议题开展角色扮演式议事会,并选拔优秀学员参与真实项目设计;建立“社区提案直通车”机制,“参加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可直接纳入村级年度工作计划。

第四,支持层:构建社区参与的培育生态系统。发挥亲属、邻里等强关系网络的“信任背书”作用,通过家庭积分榜、邻里帮扶组降低“参加者”的参与心理门槛;同时,合理利用返乡青年、驻村企业等弱关系链接外部资源。通过“技能赋能—资源激励—权力重构”的螺旋上升路径,系统性破解“参加者”的能力鸿沟与参与惰性,为乡村振兴培育可持续的参与中坚力量。

(三) 角色激活,引导“潜能者”重视参与

“潜能者”作为乡村振兴的隐性人力资本,其参与逻辑呈现资源禀赋、利益感知、价值认同的三重特征^[26]。研究发现,该群体普遍存在参与意愿隐性化与能力显性化不足的矛盾,需要构建外部激活、内部驱动、文化认同和机会创设的多维角色激活体系,逐步调动“潜能者”在沟通、示范、供给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积极性^[27]。

第一,外部激活,构建利益联结网络。依托数字技术搭建“技能银行”平台,将木工、电工等专业技能人才的服务能力转化为标准化积分,建立“技能—积分—权益”的转化机制,允许积分兑换养老服务、子女教育等发展型权益,形成可持续的乡村人才激励循环。同时,建立线上交流社群,实现村务资讯实时共享,增强外出务工“潜能者”的虚拟参与感,形成“数字黏合—情感维系—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28]。

第二,内部驱动,创新利益分配机制。推行技术入股与电商分红,如手工艺人可将一定比例的作品收益注入村集体基金,同时享受电商平台流量扶持^[29];技术人才通过数字平台承接跨村作业,收益按比例反哺村道养护。配套实施“新农人培育计划”,通过远程教育平台提供农业技术、市场营销等课程,培养“技能型+经营型”复合人才^[30]。

第三,文化激活,重塑价值认同体系。举办“乡村工匠文化节”,通过非遗展示、技艺竞赛等活动,构建社区文化认同空间;打造“乡村工匠工作室”,将传统技艺纳入乡村文化IP开发,形成“技艺传承—文化增值—经济收益”的价值链^[31]。

第四,机会创设,建立弹性参与支持体系。设置河道巡查、文化讲解等弹性岗位,允许“潜能者”自主选择服务时段。对于“潜能者”中的女性群体,实施“她力量”赋能计划,提供兴农补贴并设立女性管理岗位,提升其生计能力^[32]。此外,可以引导城市居民参与乡村建设,既缓解“潜能者”的生计压力,又促进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

(四) 价值联结,增强“观望者”参与热情

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参与呈现显著的“能力—资源”二元分化特征,针对“观望者”,需通过“低门槛介入—即时反馈激励—深度参与赋能”的三阶递进机制,系统性缩小参与鸿沟。

第一,感知唤醒阶段,重构参与价值认知框架,降低“观望者”的初始参与成本。针对观望者参与认知模糊的问题,实施“乡村文化解码计划”,以沉浸式体验重塑其价值认同^[33];开展农耕文明探源、非遗工坊开放日等活动,组织插秧、酿酒、剪纸等传统实践;开发“村史数字博物馆”,利用VR技术重现村庄发展历程等。“观望者”往往由于觉得参与程序复杂或负担过重而退

缩,因此,活动策划要遵循“三简原则”:宣传语言采用方言俚语,如“扫扫地、换米油”、参与流程简化为“扫码—选任务—打卡”三步、反馈机制实现当日积分兑换,降低其认知与操作成本。此阶段通过“做中学”消解“观望者”的疏离感,使其在文化认同中萌发参与意愿。

第二,行为介入阶段,设计轻量化参与机制,强化“观望者”的参与行为持续性。构建“微参与”支持系统:建立“时间银行”任务库,设置1小时垃圾分类督导等微任务;推行“积分通兑”制度,积分可兑换超市购物券、医疗体检等权益;设计“参与盲盒”机制,随机分配文化活动或环境巡查等任务,增强参与趣味性。此阶段通过“游戏化+即时收益”模式破解参与畏难心理,推动“观望者”从“旁观者”向“体验者”转化。

第三,身份融入阶段,构建持续参与生态,提升“观望者”的主体能力。实施“成长合伙人”计划:建立“参与档案”,记录“观望者”的服务时长与技能成长轨迹;设立“微基金”,对持续参与者提供创业贷款贴息,推动生计资本建设和公共资源的高度社会化转化^[34]。配套设立“心理驿站”,为丧偶者及失业群体提供个性化辅导服务,帮助其构建健康的自我调适机制,逐步转化为具备主动创造与贡献能力的个体。此阶段通过“权利—资源”双通道绑定,促使观望者从“短期参与者”升级为“社区共建者”。

(五) 协同保障,推动居民参与的动态转化

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各类参与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领导者”引领方向,“参加者”积极实践,“潜能者”蕴含潜力,“观望者”则有待转化。需构建“动态监测—制度衔接—文化认同”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保障四类居民参与类型的有效衔接与动态转化,实现从“观望者→潜能者或参加者→领导者”的进阶(见图2)。

第一,动态监测机制。在数字条件较好的地区,试点开发居民参与行为数据库,实时记录

积分获取、技能提升、项目贡献等核心指标,通过可视化面板动态展示居民参与转化进程;并尝试开发智能预警与匹配功能,如当“参加者”连续3个月无能力提升时,系统自动推送定制化培训课程;为“潜能者”智能匹配电商运营、项目管理等进阶资源;设置“转化贡献值”指标,量化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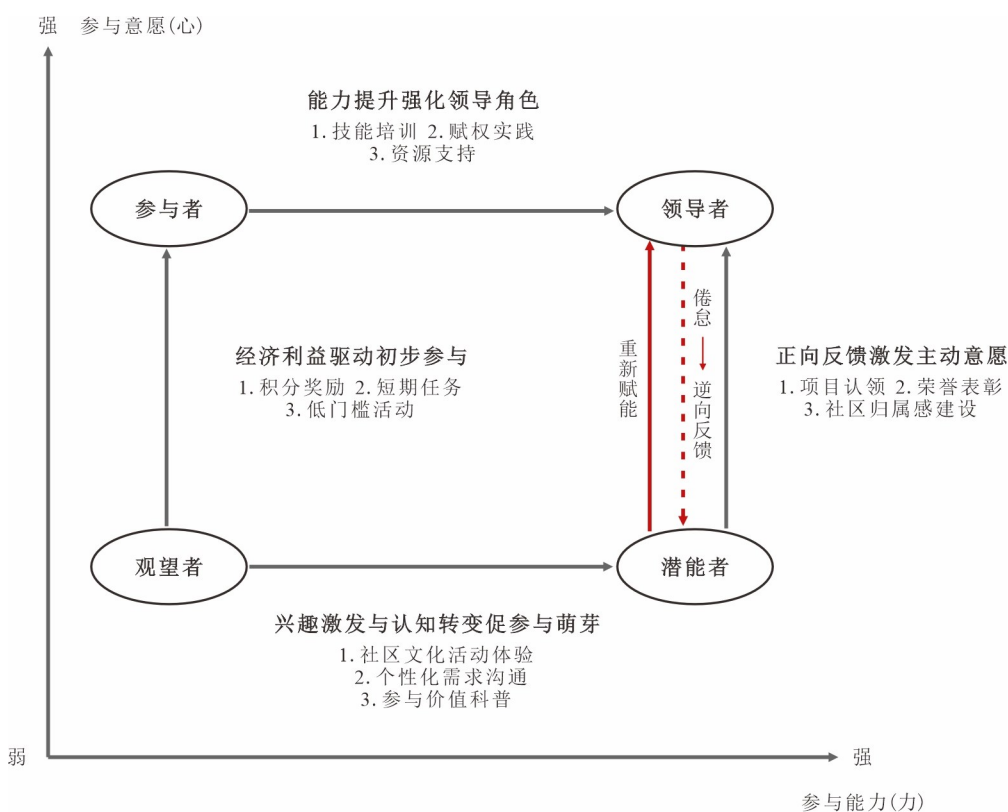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居民参与类型转化路径

体对社区发展的边际贡献,作为资源分配与荣誉评定的核心依据。其中,注意充分发挥农村居民集体组织对社区项目的监督职能,提高农村居民的主体意识^[35]。

第二,制度衔接机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台《乡村振兴居民参与促进条例》,明确四种类型的差异化权益。例如,“领导者”享有政策建议权,“潜能者”优先获得技术转化支持,保障“观望者”的最低公共服务获取权。同时,建立“乡村振兴资源池”,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赞助、社会捐赠等资金,按居民参与类型合理规划、定向投放,如为“观望者”提供小额任务启动资金,为“领导者”链接专家智库等。此外,设立“参与权益保障窗口”,快速响应居民诉求。此外,对创新性探索实行“备案免责”,允许试错空间。

第三,文化认同机制。修订村规民约,将“参与义务”纳入道德评议体系,如设立村级“红黑榜”^[36];建设村史馆、文化广场等实体载体,组织“老物件展览”“口述史采集”等社区常态化活动,强化“参与光荣”的集体认同;遴选返乡企业家、技术能手组成“乡贤理事会”,通过“结对帮扶”“能人讲堂”带动居民参与。

五、结语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通过居民主体性的系统性激活,实现治理逻辑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范式转换。研究基于“意愿—能力”二维分析框架,揭示了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异质化特征及其内在逻辑:要通过制度性引领构建“领导者”权威合法性,依赖能力跃迁突破“参加者”参与瓶颈,需要资源联结激活“潜能者”发展势能,通过价值重构重塑“观望者”参与认同。四种居民参与类型形成的差异化行动图景,为破解“普惠式”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提供了新的切口。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不仅体现于物质空间重塑,更在于通过分类激励释放主体潜能、通过动态转化推动治理秩序重构,最终形成“主体觉醒—制度创新—乡村振兴”的螺旋演进机制,实现从“政策驱动”向“主体自觉”、从“资源整合”向“价值共生”的深化转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久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杨希双,罗建文.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03):261-274.
- [2] 刘润秋,黄志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困境、政策误区及改革路径[J].农村经济,2018(06):6-10.
- [3] 肯尼斯·谢普斯勒,马雪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结构及局限[J].学习与探索,2017(01):50-56,174.
- [4]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04):23-35.
- [5] 张翠娥,李跃梅,李欢.资本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基于5省1599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6(01):27-37,50.
- [6] 边燕杰,王学旺.社会资本与乡村法治:亲友联系的作用机制[J].河南社会科学,2021,29(03):92-100.
- [7] 耿永志.农村社会治理的农民参与研究——以垃圾治理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0):513-516.
- [8] 徐琴.乡村社会的行政化整合:表征、根源与效应——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J].求实,2022(06):75-90,110.
- [9] 毛一敬,刘建平.重塑治责与农民履责: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J].农村经济,2023(11):95-104.
- [10] 刘长勇.生活满意度、政策认同与农民的乡村振兴参与意愿——基于全国223个村庄1163位农民的调

- 查分析[J].武陵学刊,2020,45(05):53-61.
- [11] 李华胤.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J].理论与改革,2021(04):116-128.
- [12] 李宁.中坚农民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4(01):124-132.
- [13] 胡博成,朱忆天.乡村振兴战略场域中的“中坚农民”培育:困境与应对策略[J].经济学家,2021(11):110-118.
- [14] 望超凡.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基础、治理绩效与优化路径[J].决策与信息,2024(03):38-48.
- [15] 俞菲菲.“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别[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06):92-102.
- [16] 王向阳,吴海龙.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农民工群体打工行为的差异化阐释——基于浙江店口贵州、江西、安徽三地农民工打工生活的考察[J].求实,2020(04):97-108.
- [17] 徐林,徐畅.公民性缺失抑或制度供给不足?——对我国社区参与困境的微观解读[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2):32-40.
- [18] 鲁圣鹏,孙雨昕.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形成动因与推进策略探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2):70-76.
- [19] 湛礼珠,罗万纯.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2):86-101.
- [20] 汪杰贵.论我国农民自组织“内卷化”危机与出路[J].农村经济,2014(11):7-12.
- [21] 张必春.“脸面观”视角下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分析[J].中州学刊,2024(02):87-94.
- [22] 陈朋.乡村振兴中基层干部激励机制的多样态及内在逻辑[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24(03):69-77.
- [23] 郑浩生.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01):25-34.
- [24] 唐南.社区文化保育:凝聚社区居民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探索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0):288-290.
- [25] 赖庆奎,晏青华,张静.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及社区参与途径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3(06):70-74.
- [26] 刘小珉,刘诗谣.乡村精英带动扶贫的实践逻辑——一个基于场域理论解释湘西Z村脱贫经验的尝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2):74-85.
- [27] 刘晓雯,李琪.乡村振兴主体性内生动力及其激发路径的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08):27-34.
- [28] 唐有财.公共危机背景下社区共同体的构建[J].社会科学辑刊,2023(01):86-94.
- [29] 王辉,李瑞,黄杏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1):37-47.
- [30] Llopis B G, Pla I J. Are Public Subsidies to Encourage Young Farmers Effective? Case Study of a First-Time Farm Set Up by a Young Female Farmer in the Valencian Region of Spain[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6):9320.
- [31] 韩道铨,田杨.韩国新村运动带动乡村振兴及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4):20-27.
- [32] 李飞,李欣玥,肖志芳,等.农村妇女本地就业如何提升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基于帮扶车间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24(02):146-167.

- [33] 郭树洁,徐玉婷,宫园.“情感地理”研究进展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18-31.
- [34] 印子.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7(01):163-172.
- [35] 义旭东,赵佳伟,兰虹.PPP模式:乡村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的新选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3):15-24.
- [36] 池建华.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J].农业经济问题,2019(09):46-53.

责任编辑:杨春风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Classification and Incentive Strategies for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ZHOU Yanyan, ZHANG Yifan

(School of Law,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5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illingness-ability"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develops a four-quadrant model categorizing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into Leaders (high willingness, high ability), Participants (high willingness, low ability), Potential Participants (low willingness, high ability), and Onlookers (low willingness, low ability). Empirical analysis has found that the core contradiction restrict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s: weakened community identity, activity supply-demand misalignment, and imbalanced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Targeted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or Leaders, a multidimensional empowerment system integrates resource allocation, honor incentives,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error-tolerance mechanisms; tiered capacity-building transitions Participants from manual labor to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Potential Participants' strengths are activated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 linkage, innovative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cultural identity reinforcement, flexible post creation, and skill capitalization; while Onlookers are engaged via low-threshold entry, prompt feedback, and deep engagement mechanisms. A three-dimensional safeguard—dynamic monitoring, institutional articul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cultivation—collectively fosters participatory habitus, enabling dynamic transforma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cross all group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centive strategi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primary-level governance